

对爱情的绝望。王佳芝此后的命运可想而知。

因此，在第二大板块的主题表现即展示个体的悲剧性生存中，影片相当深刻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王佳芝怎样一步步在环境的威逼利诱之下被彻底征服与摧毁。在第一板块结尾时，王佳芝在镜头中跑入画面景深处的黑暗中。这喻示着她的命运被黑暗笼罩，也喻示着她抛弃了原先的信念。因为在接下来的镜头中我们将看到，王佳芝已经在自己的荒诞体验中无法自拔而对民族苦难视而不见。当王佳芝排队买米回来，镜头从抬死人的画面摇向正走过的她，而她对这一切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径直走了过去。这让我们感受到她脱离了崇高的民族情感之后的冷漠。这种对世界的冷漠在看电影一场戏中同样表现了出来。

《色·戒》的情节是比较曲折和跌宕起伏的，导演李安曾表示：“《色·戒》真的很难定义，我希望它是一次对人性很幽微的探索。”⁽⁴⁾因此，从电影配乐角度而言，自然对其要求也相当高。

在本质上，电影音乐属于运动觉，即运动的情感物质。它能够笼罩和浸透人们的灵魂。强烈的音乐具有和特写镜头类似的效果，并往往与之匹配。普多夫金说，音乐表达了对影片客观性的“主观评价”。⁽⁵⁾《色·戒》电影配乐中，精准掌握电影的悲剧氛围，将凄美却又略带悲壮的气氛绵密铺陈。主题旋律在优雅中隐含着不安与不祥，主奏的大提琴紧紧牵系着爱欲与暗杀的情绪，而陪衬的乐器，无论是钢琴或是弦乐，都让无穷的余韵深切地拨动观影者心底的泪眼之闸。⁽⁶⁾

比如在电影的结尾处，影片采用大提琴来延续这种悲凉气氛，暗杀最后的失败和爱欲的延续及男主角残酷而无奈的眼泪最后都在音乐中得以延伸，女主角最终被情所俘获，付出的是自己的生命和她背后许多年轻的生命。大提琴悲凉的音乐是在哭诉抑或是在为这群年轻的生命弹奏一曲安魂曲，给观众留下更多的联想，使得银幕形象更丰富、生动、真实。⁽⁷⁾总之，李安通过《色·戒》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侧面的历史叙事，揭示出不同以往的家国叙事下的另一种生命体验。

在一个月前刚刚结束的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李安导演分享了他对电影创作的独特见解。他提出，通过电影让中国古典文化里的诸多宝藏为人所知，让中国文化真正拥有话语权。综观李安几十年来的电影创作，甚至包括即将上映的《中场无战事》，我们不难看出李安一以贯之的努力——将东方民族特有的表达方式、情怀和逻辑转换成世界语言。而如何把这种探索的过程进一步转换为一种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践行！

(赵志奇，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讲师，450044)

(4) 钟平丹《电影：从色·戒到色相——李安创作谈综述》，《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 转引自 David Lewis Yewdall《电影声音实用艺术》张岳等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年版，第123页。

(6) 陈梁《关于音乐在电影中作用的探讨——色·戒电影音乐赏析》，《大众科学（科学研究与实践）》2008年第1期。

(7) 方丽萍《电影色·戒中音乐与情节的双向互动》，《电影文学》2009年第24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意识形态视野中的音乐电影*

The Musical Film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Ideology since 1949

文 初健 / Text/Chu Jian

提要：在社会的不断前进中，文化意识形态不断发生着变革，影响着中国音乐电影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格局影响下，音乐电影创作在收聚民心、巩固政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市场经济涌入与长期的国家文化形态一元化格局产生了强烈碰撞，音乐电影创作回归自我，具有纪实性美学的倾向。新世纪，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走向了多元化，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碰撞产生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为中国音乐电影创作提供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空间。音乐电影作为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的双刃剑，要想实现其更好发展，我们只有紧跟时代的脉搏，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深层次挖掘社会矛盾，更好挖掘音乐电影创作的素材，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音乐电影作品。

关键词：意识形态 文艺创作 音乐电影 文化产业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文化生活通常是在三个不同界域展开的：一是主体和主体世界，二是客体和客体世界，三是主客体世界之间的媒介物。毋庸置疑，人们生活的文化价值必定最终聚焦在意识形态的问题

上。因此，人们在享受大量文化艺术的同时，这些文

* 本文系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高校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2400410169的阶段成果。

化手段也向我们渗透出大量的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其中，电影艺术作为一种影响力巨大的文化娱乐形式，通过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再造出人生百态，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观众在影片欣赏的过程中，通过影像、特技、声音、音乐效果等强烈的感官刺激体验，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从而认同影片所传达出的审美观点和价值观念。因而，电影艺术具有对人意识观念和精神启发的功能，让其承载了文化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价值。

音乐电影是电影艺术与音乐艺术密切融合的艺术形式，由于其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具有一般电影作品难以表现出的艺术内涵。我国的音乐电影创作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却依旧摆脱不了创作数量少、创作质量差的窘境。在文化意识形态的视野下，中国音乐电影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在文化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充分发挥文化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解析文化意识形态与音乐电影创作的内在关联，避免盲从于西方音乐电影创作、避免过于迎合商业逐利而出现创作低俗化显得十分紧迫。

一、文化意识形态对音乐电影创作的影响

何谓音乐电影？美国电影理论家托马斯·沙兹对其定义为：以音乐生活为题材或音乐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影片。⁽¹⁾音乐电影以音乐为题材或以音乐为主题，在影片当中，音乐作为核心的表达手段，是电影剧情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影片的构成起着极其重要的功能性作用。突出的表现手法、丰富的表现形式使音乐电影更容易创造出感人至深的表现效果，它制造出的画面、声音效果，营造出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以及影片中被广为传唱的经典电影歌曲，常常令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它是深深植根于人们意识形态之内的。在时代的变迁中，音乐电影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时期特定的意识内涵特征，发散出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音乐电影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借助艺术手法的渲染，可以进一步刻画社会生活的理想方式，从而有目的主导着社会公众的文化意识和社会舆论。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仅传统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新事物、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每日每时都向我们涌来。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意识形态研究已成了一个包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理论任务。”⁽²⁾将意识形态作为对电影艺术思考的出发点，表明人们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这也是人寻找已迷失的自我和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对于人文化意识形态的引导，是人们拥有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它潜移默化改造和影响人的文化生活，加速着人的精神建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音乐电影创作高潮中的精英意识形态

音乐电影诞生和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国家。由于“百老汇”的音乐剧目在美国常演不衰，观众百看不厌，于是人们将百老汇音乐剧改编为电影，放在大银幕上播放，成了音乐电影最早的形式。美国华纳影片公司1927年摄制的《爵士歌王》⁽³⁾取材于“百老汇”的故事改编，是电影史上最早的音乐电影。

对于我国来说，音乐电影集中出现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解放初期，影响力较大的歌剧《白毛女》被搬上银幕。创作者对其在原有歌剧的结构上，根据电影艺术的特点进行了再加工，中国生产出第一部音乐电影作品。这部音乐电影创作上的巨大成功产生了示范性的效果。之后，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7年、1959年和1960年陆续拍摄了拉祜族音乐片《芦笙恋歌》、白族爱情音乐片《五朵金花》和具有浓郁壮族特色的风光音乐故事片《刘三姐》，1961年歌剧故事片《洪湖赤卫队》《红珊瑚》创作完成，1964年后，再有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阿诗玛》、舞台歌剧艺术电影《江姐》等经典之作问世。这些音乐电影的创作生产，形成了中国音乐电影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政权尚未牢固。国家将文化意识形态工具牢牢控制，形成了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格局。这一时期的音乐电影创作收聚民心、巩固政权，将西方的这种舶来品进行本土化创作，既得到了艺术效果的成功，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效果。

这一时期的音乐电影作品，多为经典故事的再加工，《白毛女》《刘三姐》《阿诗玛》《红珊瑚》等描写的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剧情加上一首首经典歌曲的渲染，让社会制度交替下的人们通过鲜活的事例对新的社会制度加深了认识和理解，统一了思想，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憧憬；《洪湖赤卫队》《江姐》《闪闪的红星》等影片则树立了光辉人物的形象，这些英雄精英人物的塑造产生了形象启发的功效，其树立的“舍小家、为国家”“党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昂扬的英雄形象既充满了激情，又营造出浪漫主义色彩，引导和树立了主流价值观。这些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引领时代风气、凝聚中国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的音乐电影创作中，少数民族题材作品的创作尤为突出。如壮族的《刘三姐》、拉祜族的《芦笙恋歌》、白族的《五朵金花》、彝族的《阿诗玛》、藏族的《柯山红日》以及接近于音乐电影描写塔吉克族军民生活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等等。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少数民族歌舞资源丰富不乏关联，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与新政权下强化各民族的融合，构建少数民族对新政权的

(1)(3) 司思《论中国音乐电影的空白和发展前景》，《东南传播》2014年第4期。

(2)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认同密切关联。这些影片营造出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稳定、和衷共济增添了浓墨重彩。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⁴⁾一个阶段革命的观念形态或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舆论准备，在革命中是战略的重要环节，在革命后是人思想再次革命的新的起点。故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文艺为政治服务”⁽⁵⁾的创作语境中，音乐电影出现了创作上的繁荣。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精品，很多音乐电影和其中的优秀歌曲根植于人们的心灵，伴随着那个年代人们的成长，成为一代代人人生追求的座右铭。这时期的艺术创作不需要顾及影片创作的商业性价值，在单纯的文化意识形态下深厚地挖掘出艺术要素的潜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三、“文革”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化意识形态下的中国音乐电影创作

十年浩劫后的中国满目疮痍，在经历了这场疯狂的文化灾难之后，长期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使中国电影创作者开始思考文化本位上的理性回归。“文革”对人性的疯狂摧残、对人的生命和基本权利的疯狂践踏，让创作者呼唤人性的尊严，呼吁对人性的尊重，追求具有独立意义的人生价值。他们把目光瞄准在人的本体，开始关注和描绘普通人的情感世界，揭示人性的美好。

这一时期，音乐电影的主题内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经典传统故事的再加工和英雄人物的塑造已经不再是音乐电影创作的主体。艺术创作的对象变得广泛而深入，艺术家的视觉从英雄精英转向了普通大众。

由于“文革”期间对电影产业的极大破坏，这一时期音乐电影的产出较少。在“文革”结束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共生产出音乐电影十部左右。这些影片中，198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录制的《同心结》描写的是中朝友谊的内容，198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丝路花雨》描写的是古代历史故事，而1985年上映的《大明星》、1988年由田壮壮导演的《摇滚青年》、刘国权导演的《疯狂歌女》、广春兰导演的《西部舞狂》、1990年孙浩主演的《天皇巨星》及1995年上映的《天涯歌女》则都属于娱乐性歌舞片的范畴。

尽管这一时期音乐电影创作数量不多，且影片的艺术质量和影响力远远比不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电影第一次创作高潮期的作品。但是，我国音乐电影在创作内容和表现手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将我国音乐电影创作引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表现主题上，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一直坚持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被打破，固定的精英形象的音乐电影创作模板逐渐发生着改变。都市青年的思想观念、人生信念，他们现实成长中的迷茫与困惑、他们对自由的崇尚都成为影片描写的主题。

在创作手段和风格上，很多影片参照了美国百老汇歌舞片的创作手法，大量的摇滚乐，现代流行音乐以崭

新的姿态进入音乐电影的创作，人性的宣泄和个性的张扬在影片中尽情地释放，音乐电影的娱乐性特质在我国音乐电影创作中开始体现。与我国音乐电影发展的第一阶段相比，大量的西方音乐风格的引入，也改变了以往我国音乐电影创作中几乎完全采用民族音乐的现象，丰富了音乐电影的表现手段。

马尔库塞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这种新的集权主义恰恰呈现为一种和谐化的多元主义，最矛盾的作品和事实和平地、冷漠地共存着。”⁽⁶⁾音乐电影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变化，是市场经济涌入后与长期的国家文化形态一元化格局的碰撞。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悄然发生着改变，“文艺为政治服务”被“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⁷⁾取而代之，在人的意识觉醒下，音乐电影展开了回归自我的创作，由描述革命性斗争走向了纪实性美学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我国音乐电影创作上的一大进步，电影艺术已经以自己的逻辑改造了整个意识形态，并使文化叙事的合理性作为社会和大众文化真正的灵魂。

四、市场意识形态下的当代中国音乐电影创作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深刻变革。总体来说，我国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国家领导人根据我国社会环境不同时期的状况，对意识形态工作都做出过重要的指示。1994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并指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⁸⁾胡锦涛同志也曾指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⁹⁾这些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创作的内涵，为实现跨世纪的国家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2013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5)(7)唐旭斌《周扬与现代革命文艺运动》，南京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10页。

(6)H.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P3.

(8)吴茂昌《江泽民对音乐方面“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思考》《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

(9)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1月10日。

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¹⁰⁾

综上所述,中国成熟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在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意识形态学说,深刻反省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新的意识形态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各种曲折后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新时期电影艺术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能,担负起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重要责任。与此相连的新时期音乐电影,创作领域不断被延展。创作者全面、深入审视市场经济浪潮中发生的社会重大事件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聚焦新时代背景下人性的价值观,凝聚中国力量,构建和谐之音,抒发人性之美。从这一时期许多的音乐电影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人的主体精神的热情挥洒抒发。

从2002年起,中国音乐电影的创作再次达到了一个高潮。2005年上映的《如果·爱》可谓这一时期我国音乐电影作品中的佳作,影片揭示了商业社会环境下,普通人爱情观和价值观的内心变化。2011年上映的《钢的琴》被誉为这一时期的音乐电影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部。在选题上,这部电影选择了当下社会矛盾尖锐的下岗职工的内容,把视觉对准东北老工业基地,将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真实呈现给观众。

这两部现实主义作品中呈现的内容,都是社会转型期社会尖锐矛盾的直接描写,这在过去音乐电影的创作上是不敢想象的。

迄今为止,我国音乐电影中票房收入最成功的作品是2013年上映的周杰伦的音乐电影《天台爱情》。截止到2013年7月,这部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票房收入就超过1.07亿元。⁽¹¹⁾音乐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其商业价值的获得与其体现出的社会影响力和受众程度是密切关联的。这部爱情片把一对小人物生活的世界比作天台,诠释出普通人对爱情观的理解,在对他们爱情的叙述中,树立了新时期正能量的价值观。这部作品中也同样揭示出社会的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还出产了一些模仿西方音乐电影创作的作品。美国音乐影片《歌舞青春》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青春音乐电影的热潮。中国的音乐电影创作者照搬炮制这部影片,2008年到2010年先后有《精舞门》《舞魅青春》《歌舞日记》和中国版的《歌舞青春》多部作品问世。尽管《精舞门》有大牌明星范冰冰出演,其他几部影片也有著名演员加盟,但是对西方创作内容的全盘照搬,脱离了中国人的文化审美习惯和现实国情,上映后遭遇到尴尬的境地。

从2002年至今,中国音乐电影还有2009年上映的描写普通人物梦想的喜剧音乐片《高兴》、描写拉丁舞者生活的《斗爱》、冯德伦指导的喜剧励志片《跳出去》、2009年王硕等创作的描写几个年轻人创作音乐剧的故事《爱我就给我跳支舞》以及2010年上映的描写广西风土人情的《寻找刘三姐》等影片。

这一时期成功的音乐电影创作,抓住了意识形态与

市场经济的碰撞中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很多音乐电影着眼点深刻,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富有广度和深度的拓展空间。这些作品中折射出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着新时期的人们不断努力实现自身价值,让自己的思想观念更好地适应于时代。

结语

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是意识形态的危机。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传播手段的恰当结合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曾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¹²⁾音乐电影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传播手段,时刻体现着国家政权指导下的文化意识形态。抓住了意识形态的规律,把握了正确的文化意识导向,可以引导民众在新形势下紧跟时代的脚步、把握前进的方向,让音乐电影的创作更好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国家和社会在不断前进中,文化意识形态也不断发生着变革。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从一元制发展到今天的多元共存,中国音乐电影的创作风格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中国音乐电影发展的三个不同时间段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单纯的意识形态中,在专政的一元化文化意识形态下,中国音乐电影深深地挖掘出艺术潜能,取得了中国音乐电影创作的第一次繁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今天多元复合的文化意识语境下,一些优秀的创作者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寻求文化创作与意识形态上恰当的结合点,在挖掘和化解现实社会矛盾中进行创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无论是普通个人的主观意志,还是伟大个人的主观意志,都可能通过意志的合力对客体和客体世界产生影响,甚至是重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客体和客体世界正是依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这里有一个必要条件,即个人意志必须沿着切合于意志合力的方向去发挥作用。”⁽¹³⁾在现代社会,音乐电影作为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的双刃剑,要想实现其更好发展,我们只有紧跟时代的脉搏,在未来的创作中,贴近国家发展的重大政策,聚焦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了解群众的想法,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深层次挖掘社会矛盾,才能更好挖掘找到音乐电影创作的素材,并从中深刻地挖掘、探讨人性。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音乐电影作品,引导民众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对生活对社会去正确认识和把握,从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收益。

(初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副教授,450000)

(10)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11) 同(1)。

(12) 蔡武《深入学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拓文艺发展繁荣新局面》,《时事报告》2015年第1期。

(13) 同(2)。